

全球化年代的後殖民論述

朱耀偉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摘要 八十年代後殖民論述在歐美學院發展蓬勃，九十年代全球化論述逐漸興起，兩者之關係相當微妙。論者對此持不同看法，有人視後殖民論述為有利全球化的論述工具，亦有人以後殖民論述為抗衡全球化的本土論述的主要理論架構。本文擬重新解讀後殖民論述中的重要觀念（如混雜），藉此帶出後殖民論述在全球化年代的文化意涵。比方，“混雜”被認為可指向新世界公民主義，但到底如此的世界公民主義與全球化的關係如何？“國族”、“混雜”等觀念在新世界秩序的論述中又佔甚麼位置？本文希望將後殖民論述置於全球化的脈絡作出省思，探析當中可能隱含的啟示。

一 緒言

後殖民論述在八十年代的西方學院發展成一門顯學，專書、論文、研討會、學院課程有如雨後春筍。“後殖民”歷史早於二十世紀中葉已經開始（從前的殖民地先後獨立），而常被後殖民批評家引用的范農 (Frantz Fanon) 在六十年代已有相關著作，但後殖民論述的真正興起還有待七十年代後期《東方主義》¹ 推出之後。八十年代，後殖民論述在西方學院匯聚了不同學科，流佈廣遠，影響的範疇愈來愈大。相對之下，雖然香港當時正經歷前途問題的困擾，但學院有關後殖民論述的討論卻是十分匱乏。直至八十年代後期，後殖民論述才在比較文



學和社會學等學科惹起關注。隨着九十年代初文化研究在學院迅速興起，後殖民論述亦變成中心議題之一。後殖民論述對本土、他者、身分認同等問題的反思正好配合香港人的九七恐懼，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在香港的後過渡期可說是愈夜愈美麗。九七轉眼過去，有關九七的身分激辯在九七的反高潮中落幕，在五十年不變的堂皇大話中，九七居然沒有帶來翻天鉅變，後殖民論述亦看似再難領風騷。同時，全球資本主義急劇擴張，全球化理論的浪潮在九十年代開始席捲西方學院，在香港，全球化亦在九十年代中後期變成文化研究的主要議題。表面看來，後殖民論述的光輝歲月已隨九七過去，但其影響對文化身分的討論十分深遠，其所帶出的不少課題在新千禧的文化研究其實仍然縈繞不休。比方，殖民者 / 被殖民者、東方 / 西方、中心 / 邊緣等理論架構在國界逐漸模糊、跨國流動日漸頻繁的全球化年代新世界秩序中常被看作不再適用，但在代之而起如全球 / 本土的理論架構中，以上的二元框架往往有如陰魂不散，暗地裏影響着表面看來跨越邊界的全球化論述。理論家從前常問：“後殖民何時開始？”本文把重心稍為扭轉，將議程導向後殖民是否已經淡出的問題。

正如文化研究鼻祖賀爾 (Stuart Hall) 在九十年代初所言，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我們不外剛剛開始以全新形式理解跟過去一式一樣的衝突和鬥爭”。² 也許正因為此，九十年代後期，後殖民論述雖已進入後光輝歲月，但仍然不斷有重要的後殖民學刊在西方學院創立（如《介入》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後殖民研究》 [*Postcolonial Studies*]、網上期刊 *Jouvert: A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等）。其實後殖民論述對不少問題的反思，跟全球化年代的中心議題可有眉目互通之處，正如《介入》的創刊編輯楊格 (Robert Young) 在申述他創辦此期刊的目的時所



述，我們身處一個既可彰顯也可壓抑自由公義的全球化網絡中，“《介入》將不單是有關後殖民文化，更主要是由參與其中者以多種不同的形式書寫而成的”。³ 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在全球化的格局中重新理解跟過去同樣的衝突和鬥爭，以不同的角度參與後殖民論述的書寫。當然，我們也得記住，當某種論述過分擴張時，就可能引起誤解和混亂，戴力克 (Arif Dirlik) 便曾提醒我們，“後殖民批評愈來愈普及之時，它會牽涉入與它不太相關的學術實踐中，而在過去三十年間它又不斷在不同方面吸納學術研究方法，情況難免變得更加混亂”。⁴ 本文因此無意亦無法釐清後殖民論述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的複雜轉變，反而嘗試將矛頭指向後殖民和全球化論述的關係，再逐一瞄準國族 (nation)、混雜 (hybridity) 和世界公民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觀念，並進而考量兩者互為關鎖的互動情況。

二 當後殖民遇上全球化.....

單從批評論述的發展歷史脈絡來看，八十年代中後期可算是後殖民論述的黃金時期，到九十年代，其位置漸由冒起甚速的全球化論述所取代。然而，若說後殖民和全球化論述只是先後或因果關係，就似乎是將問題過分簡化了。要了解後殖民論述，就有必要考量其在全球化年代的轉化，更重要的是深入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且先從全球化說起。全球化從七、八十年代以經濟為主，到九十年代開始變成幾乎所有系科都關心的中心議題，影響全面之餘亦難以輕易界定。按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的說法，我們可以從四個位置理解全球化：(1) 全球化根本不存在，民族國家、國際狀況依然舉足輕重；(2) 全球化並非新事，從前舊時代的貿易關係已相當全球化；(3) 全



球化與世界市場有關，現在的全球網絡與從前只是程度上，而非種類上有所不同；及（4）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新 / 第三 / 多國階段的內在特徵。⁵ 籠統來說，人們對全球化可簡略概括為歡迎和貶斥兩大類，正方的意見主要為本土問題可聯繫到全球關注，反方則擔心那會使本土文化原創性消亡。⁶ 姑勿論是正是反，重要的是文化之間的流動和翻譯 (translation) 變得無可避免。⁷ 在如此脈絡之中，後殖民論述經常提到的夾縫性、混雜性等觀念便更形重要，而詹明信提到的四個位置其實都與後殖民論述息息相關。借用巴莉 (Benita Parry) 的說法，“跨國文化交通的全球化流動已經製造出一種崛興中的後殖民世界公民主義 [postcolonial cosmopolitanism]”。⁸ 從此可見，在全球化論述中，後殖民的一些重要觀念與後殖民論述本身不但未有消滅，反而以不同形式按不同情況發展為更重要的議題。

為何後殖民論述的理論觀念會在全球化論述中繼續演化？到底後殖民和全球化的關係如何？刁寧 (Simon During) 曾以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解析兩者的分別，將後殖民界定為“去歷史化” (de-historicisation) 的時間性理論，而全球化則為“去畛域化” (de-territorialisation) 的空間性理論。⁹ 此說縱有可取之處，但簡單的二元描述始終無法涵蓋個中的複雜情況。有關後殖民和全球化的關係，最惹人爭議的可數戴力克的說法。戴力克在其廣為人談論的《後殖民氛圍：全球資本主義年代的第三世界批評》一書中提出，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無非是配合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即是說後殖民論述在西方學院火速崛起，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西方學院發聲，其實不外令邊緣變得“多孔”，從而更容易吸納非西方精英和疏減邊緣對中心的抗拒，有利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¹⁰ 三好將夫 (Masao Miyoshi) 也直言，在全球化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機構——跨國企業——將從前的剝削模式



深化，具體延伸了殖民主義。¹¹ 戴力克在後來的一篇文章又提到兩者的分別，聲稱兩者的差異在方法論和歷史性之上：“從方法論來說，後殖民主義……重視身分認同構成的本土情況，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是由一種基進的個人主義的方法論驅動的，其歷史上的闡釋則是境況性的。另一方面，全球化叫人關注由在最高層次的抽象概念中運作的不同力量所形構的世界……”。¹² 再者，兩者呈現一種辯證關係：後殖民“拒絕接受除了本土以外的一切形構”，全球化則“企圖揭示全球結構”。¹³ 總而言之，戴力克認為後殖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後殖民知識分子的理論中缺席的情況是相當特別的。¹⁴ 戴力克無疑提出了很有趣的看法，但若說所有後殖民知識分子都未有考量全球資本主義與後殖民的關係，就未免有點武斷。賀爾便曾回應戴力克說，“部分”後殖民知識分子未就全球資本主義與後殖民論述的關係置喙的說法會更合理。¹⁵ 薩依德 (Edward Said)、巴巴 (Homi Bhabha)、施碧娃 (Gayatri Spivak) 等後殖民知識分子早期的理論或未直接訴諸全球資本，但其實在不同層面也曾碰觸到類似的問題。比方，施碧娃在其作品中，也有一再以全球資本為例分疏她的“後殖民理性”。¹⁶ 賀爾亦嘗言，“後殖民重讀殖民，視之為跨國 / 跨文化的全球過程的組成部分”。¹⁷ 也許戴力克的目的是刻意強調後殖民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共謀的重要性，多於批判後殖民知識分子身陷全球資本主義和因之而起的全球化學術機制而又不自覺。雖然上文已曾提出，後殖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二分看法過分簡單，戴力克對兩者的表述仍可有助我們釐清問題。

刁寧區分兩種不同的後殖民主義的做法可以用來補充戴力克的論點。他以“批判式後殖民主義” (critical postcolonialism) 來論述全球化的過程中，基進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如何重新發現、建構差異和其他被邊緣化的不同歷史，藉以抗衡西方的方



式。¹⁸ “批判式後殖民主義”跟一般與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有共謀關係的“順從式後殖民主義”(reconciliatory postcolonialism)絕不相同。¹⁹ 戴力克所針對的可能是後者，但後者的存在卻不一定等於前者的缺席。換個角度來看，後殖民論述（也許很多不同論述也一樣）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刀，可以是批判全球霸權的武器，也可以是鞏固霸權的工具。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抑 / 或問題，可以有神奇的魔術棒輕易地去蕪存菁，封住利刀的其中一刃。要避免——或只能儘量避免——原想用來對付敵人的武器反噬自己，就有必要進一步探析兩者的關係，或能從內鬆動出一些論述空間。借摩基拔(Bart Moore-Gilbert)的話來說，“全球化並不表徵着後殖民的終結，反而是其不同可能性的新開始”。²⁰ 在全球化年代，西方權力深切認識到訴諸文化論述的手段跟政經手段一樣重要，全球化因而更重申了後殖民論述的重要性。²¹ 以此為鑒，以下將從國族和混雜兩個重要方向重新解讀後殖民論述在全球化年代的位置。

三 國族的陰影

表面看來，全球化與後殖民論述的其中一大分別在於“國族”的不同定位。²² 在後殖民的抗衡論述中，國族顯然佔很重要的位置，而在全球化論述中，國界則往往被視為日漸模糊。三好將夫的著名文章〈沒有邊界的世界？從殖民主義到跨國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衰落〉²³ 便很具代表性。三好在文中闡述民族國家如何被跨國企業所取代，殖民主義（更確切來說是文化帝國主義）則比從前更加猖獗，而在談到如何在全球化經濟中作出抗衡時，他更強調跨國企業已造成了跨國界的壟斷與剝削，就連大學機制也被跨國企業的運作邏輯支



配。²⁴ 詹明信也曾提出類似看法：“西化主義者與傳統主義者的舊有基本對立在新的後現代資本主義中已經完全消失”。²⁵ “西化”與“傳統”顯然是在固有的國族觀念下才有意義的，當國族的觀念逐漸消滅，兩者的區別亦難再成立。借羅拔信(Roland Robertson)的話來說，“世界漸漸變成一個地方”，²⁶ 那麼從前的國族疆界便顯得過時。然而，在同意世界逐漸變得一體化的同時，亦有不少批評家堅持國族在全球化的年代仍是舉足輕重。費特斯東(Mike Featherstone)和李殊(Scott Lash)便憂慮“全球文化”的觀念其實很有問題，因為我們對社會文化的概念仍然很依賴被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影響得很深遠的傳統。²⁷ 易言之，在日漸全球化的外表之下，中心與邊緣、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元神話仍在悄悄運作，尚待考察。亞馬德(Aijaz Ahmad)便講得十分清楚，國家並不像一般文學後殖民批評家所言的有如江河日下，反而卻是勢力日大，繼續操控着不同的剝削機器。²⁸ 施錫克(Slovaž Žižek)亦相信種族主義依舊存活於全球化年代強調的多元文化主義之中。²⁹ 察加伯迪(Dipesh Chakrabarty)對歐洲中心主義依然無處不在的問題亦有詳盡的討論，³⁰ 而戴力克更把矛頭直指歐洲中心主義，主張要對其作出根本的批判，就要直接面對全球化和後殖民主義的當代問題，將分析導向生活世界中的當代鬥爭的定位之上。³¹ 刁寧也認同全球化年代並不表徵種族和殖民主義式鬥爭終結，反之，鬥爭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出現。³²

國族是否漸漸消失的問題固無定論，但無論答案如何，當中也隱含着一個更重要的課題：“當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日漸消滅，我們卻見到退回一種由很富攻擊性的種族主義所推動的國族身分的情況出現，此種情況實在十分危險”。³³ 此等國族主義以抗衡全球化的姿態出現，但在兩脅插刀之際，一腔反抗殖民者的熱血卻往往叫人將最重要的問題



拋諸腦後。正如羅賓斯 (Bruce Robbins) 所言，新興的國族主義（如美國國族主義）常以為自己是公民 (civic) 而不是種族 (ethnic) 的，因此根本不承認本身是國族主義。³⁴ 國族表面上不再存在，實際上卻又在無聲無息地運作，更大的問題在於它以全球化的面貌出現，根本拒絕承認本身所隱含的國族成分。如此偽裝為公民主義的種族主義拒絕承認本身有任何種族成分，自然無法洞察其最大敵人可能就是自己。在有關國族的討論中，我們要記住的是，無論“國族”或“本土”、“地方”、“當地”等觀念，本身都可能有問題，決不是不辯自明的抗衡據點。戴力克的“批判本土主義”便正確地指出，不能將過去/本土美化，在批判當下的權力組構時也要注意過去亦可能存在類似的問題。³⁵ 再者，過去也不會坐在那裏等我們重新發現，實際上它是不停轉變的。³⁶ 蘇夏 (Ella Shohat) 十分重視後殖民論述中將過去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問題，強調最重要的是過去不應被視作可以再製的穩定事物，而是回憶和經驗敘述的斷裂組件；³⁷ 摩基拔亦以毛里族人 (Maori) 為例，說明以血緣和鄉土規限身分認同的觀點並不可取。³⁸ 要言之，這正是周蕾一再提醒我們要警惕的“原始情慾”和“血緣神話”。³⁹ 賀爾也同意這種說法，但重申那不等於後殖民論述不再適用，反之，這實在是等於說文化權力和政治鬥爭的問題更有必要置於後殖民的脈絡來思考。⁴⁰ 范農很久以前的說法也許能用來概括國族的重要性何在：“唯一可以給予我們國際向度的是國族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而不是國族主義”。⁴¹ 再者，國族意識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薩依德曾以范農為例，在其《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申述他對國族意識的看法：“除非國族意識在成功之時可轉化為一種社會意識，否則未來將沒有解放，而只見帝國主義的延伸”。⁴² 易言之，國族意識必定要不停轉化，未來才有希望見到解放。



車朋 (Pheng Cheah) 的觀點用來融攝綜貫國族在全球化年代的位置就最為適當。他提醒我們，當民族 - 國家 (nation-state) 中間的連接號隨着全球化而慢慢鬆開，有關以國族主義或世界公民主義來替代普遍主義的問題就愈富爭議。他的卓見在於點出國際主義 (世界公民主義) 的相反詞並非國族主義，而是“靜止主義” (statism)。⁴³ 換言之，上述的國族主義的問題在於其只肯擁抱過去的保守想像，而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並非一定是處於對立的情況。因此，將國族主義視作一種過時意識的想法相當危險。⁴⁴ 籠統而言，民族在後殖民論述有兩種不同位置：因為民族乃國家的意識形態延伸而反對它，或因視它為爭取人民解放的據點而肯定它。車朋認為這兩種位置看來不可調協，原因是我們錯把民族或人民視為不是純正便是已被污染的。⁴⁵ 現實的情況當然絕不是非此即彼的抑 / 或二分，因此無論視民族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延伸或爭取人民解放的據點都難免有不足之處。

那麼“民族”、“國家”在全球化年代的後殖民論述應佔甚麼位置？車朋在談論後殖民國族論述的文章時所提出的說法，或可為我們考量國族在全球化年代的位置提供很重要的啓示。⁴⁶ 按其看法，在全球化年代，民族文化往往仍然需要國家 (state) 觀念的添補，國家就如“幽靈” (specter) 般存活在民族身分之中，故此後殖民國族必須被視作是全球資本揮之不去的“幽靈”，一種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雙重屬格” (double genitive)。⁴⁷ 詹明信談論全球化和政治策略的問題時的看法或可將討論再推進一步。他聲稱我們有必要分辨為鞏固一己勢力而高舉的國族主義和反美式帝國主義、尋求自我尊重的國族主義；因為後者抗衡的正是全球化體系，而民族國家是今時今日作政治抗爭的唯一實際地盤和架構。⁴⁸ 可是，由於尋求自我尊重的國族主義也會被霸權利用為保障本身權力的工具，⁴⁹ “對全球化的抗爭雖有部分可在國族的範圍展開，



而國族主義情感可能是不可或缺的驅動力量，但卻不能單單以國族或國族主義的觀念而竟全功”。⁵⁰ 要言之，國族可能是抗爭的必要條件，卻也同時會使其陷於困境。蘇雅 (Edward Soja) 在推展其“後大都會”的理論時，也指出國族在新的權力地理中仍起作用，不過我們有必要換個方式來思考。他提出以三個不同角度來審察國族疆界的主權的變化：（1）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理歷史的脈絡；（2）在過去三十年間主導了世界面貌的再建構過程的流動情形；和（3）對表徵政治生活的空間性和管治性的多重尺度敏感的地緣政治學觀點。⁵¹ 近年的文化研究十分重視文化的“流動情形”和“多重尺度”等議題，“混雜”在此脈絡下亦變成舉足輕重的觀念。以下便將討論的重心導向“混雜”，以之窺探後殖民論述在全球化年代的可能轉化。

四 從混雜到世界公民主義

“混雜”一直是後殖民論述的中心議題之一，巴巴便一直大力推介此觀念，認定它有介入現實的干預能力，可以作為後殖民論述質疑殖民者權威的一種“戰術”：“倒轉因殖民主義否定某些事物所帶來的影響，讓其他‘被否定了’的知識重新進入主導論述，藉此疏減殖民主義權威的基礎——其確認的規則”。⁵² 按巴巴的說法，混雜可以帶出以全新方式理解和生產意義的方式的“第三空間”。⁵³ 再者，混雜常被視作可以雜交繁衍出文化主動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向一種新的世界公民主義。⁵⁴ 除了巴巴以外，大力推介混雜的文化理論家為數不少，其中較重要的一位可數簡堅尼 (Néstor García Canclini)。簡堅尼以墨西哥文化為例，說明文化混雜如何可以



帶出一種有生命力的崛興中的文化。我們且以他的論點作為討論混雜在全球化和後殖民論述中的位置的基礎。簡堅尼在《混雜文化》一書中，詳細的論證混雜文化對拉丁美洲國家的重要性。他借卡爾斯泰斯 (Manuel Castells) 的城市理論提出，城市的擴張無可避免催化了文化混雜的過程，而在日益網絡化的全球關係中，文化混雜更已是無處不在。⁵⁵ 簡氏重新追溯拉丁美洲文化近代的發展，發現混雜並不是近期才出現，而是已有長遠歷史。⁵⁶ 他也同意類似巴巴提出的觀點，相信混雜可使權力關係變得複雜，單從中產與工人階級、白人與本地人、家長與小孩、傳媒與受眾等二元框架去理解權力關係，所見的不外冰山一角。霸權與屬僚等字眼雖然沉重，但卻未能解析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流（如西班牙文化在美國南部的滲透）。⁵⁷ 一言以蔽之，簡堅尼認定文化崛興的潛力源自混雜的交媾，而不是純正的傳統。羅沙度 (Renato Rosaldo) 在《混雜文化》一書的英文版前言中對簡堅尼的混雜觀念作了十分簡扼的說明：“混雜一方面指兩個純正範疇之間的空間和它們混化出來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指跨文化交流的持續過程，是所有人類文化的現存狀況”。最重要的是，這個觀點打破混雜與純正乃二元對立的迷思，認為文化自始至終都是混雜的。⁵⁸

正因為混雜被視為可以淆亂既存模式和逗發文化活力，後殖民理論家對混雜或多或少都寄有憧憬，比方，阿柏杜萊 (Arjun Appadurai)、巴巴、施碧娃等人將一種後殖民的文化視點注入全球化論述中，打破全球化論述同質化 / 異質化的二元框架，將問題導向以混雜為本的多重尺度。⁵⁹ 混雜在此的重要作用在於暴露了全球 / 本土的簡單二分的問題，令我們從國族、本土、全球等不同尺度考量文化互動的複雜情況，引申出“全球本土” (glocal) 的複雜課題。據羅拔信的說法，“全球



本土”脱胎自日本商業策略，有將全球和本土作“嵌進式”結合的意思。⁶⁰ 此觀念可說與混雜息息相關，重點在於突破全球和本土的二元組構，情況就如拆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分一樣。由此觀之，混雜的觀念在全球 / 本土的理論框架中仍佔十分重要的位置。

同時，除了引出新論述空間外，混雜在全球化年代的轉化也呈現出複雜的問題。拉特基舒能 (R. Radhakrishnan) 便質疑混雜與權力機制無法不產生共謀：“假如混雜經常在正典式身分組構和再現模式中被視作離心的、個人的、異常的，現在它卻在冒起甚速的散居著史學中找到‘正當’的家”。⁶¹ 他又堅持，任何有關散居和混雜的論述若不能同時批判地解析國族主義就必然有問題。⁶² 楊格也提醒我們，十九世紀的種族理論亦以混雜觀念為基礎，在今日重提混雜亦難免牽涉維多利亞時期的種族主義。⁶³ 戴力克對混雜亦持保留的態度。他憂慮後殖民論述對混雜及夾縫性的推崇會反諷地重新鞏固殖民文化所遺留的等次，⁶⁴ 故他曾經提出混雜必然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混雜，決沒有第三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混雜的說法。⁶⁵ 車朋有關混雜的論點頗能持平地深察問題所在：“只有在我們將當代新殖民全球化的複雜性簡化為其中一點‘文化混雜’，有關混雜文化實踐構成了世界公民意識和顯示國族身分及民族國家已經過時的想法才能成立”。⁶⁶ 可是，現實社會卻並非如此簡單，文化再現和指涉與社會政治機制的關係亦非常複雜，我們不應一廂情願的誇大文化指涉的功用，況且“新殖民文化的意義與象徵要通過政經機制結構才能物質化，那即是說它們不能按混雜理論所期許的被重新翻譯、書寫和閱讀”。⁶⁷

因為混雜的論述或多或少與身分認同有關，混雜的討論往往會以“我[們]是誰？”的方式出現。⁶⁸ 從國族觀念的消滅到混雜到身分認同的多元性，在全球化年代，後殖民的文化思考



相信最理想的應該是“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的崛起中的社群”，⁶⁹ 而獨特地方的文化身分亦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多元而又靈活的身分認同，⁷⁰ 彷彿很自然地導向以世界公民主義為出路的眼光。何謂世界公民？借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話來說，一個世界公民能夠“明白他們所承諾之事情的本質，並考慮那對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含意”。⁷¹ 湯林信 (John Tomlinson) 更相信，只要我們對世界公民主義的不同含意有所警惕，它可以作為人們在全球化年代爭取的目標，甚至變成理想的“倫理全球本土主義” (ethical glocalism)。⁷² 城市理論家辛德確 (Leonie Sandercock) 也以“世界公民之都” (cosmopolis) 作為她的烏托邦：“在那兒，有與文化他者的真正聯繫，讓其存在的空間和對其的尊重……也有關於社會公義、公民性、社群、共同利益的全新概念……”。⁷³ 誠然，身分認同以至其他問題都不應受發言者的種族性所限，⁷⁴ 否則只會受困於類似第三世界文化必為國家寓言的窠臼。⁷⁵ 然而，世界公民的觀念聽來雖然理想，那卻並不等於說它本身沒有問題。在靈活認同的年代，彷彿國族已不再重要，但就算是翁愛華 (Aihwa Ong) 自己也注意到國族不曾真正消失，並以馬來西亞為例，論證主權並沒有消失，現實的情況不過是主權的重新組構。⁷⁶ 夏維 (David Harvey) 說得好：“世界公民主義現正重臨。對某些人來說那是好消息……它現在被描畫成在一個由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主宰，在新千禧又未見其他政治經濟選擇的世界中，可以作為爭取民主和統治之法的統一視野的觀念”，而壞消息則是世界公民主義的意義龐雜，以其作為統一的倫理道德視點難免有內在的問題。⁷⁷

也許羅賓斯的看法可以補足我們對世界公民的討論。他指出世界公民的意涵已有轉變，從現在往往被看作甩脫日常由國族規限的生活的限制，轉而忠於人類的整體利益，但他也同時



提醒我們，真正存在的世界公民主義的精粹並不在於甩脫，而是一種再聯繫、多重聯繫和保持距離的聯繫。⁷⁸ 他又引阿柏杜萊的說法，重申我們有需要重新思考單一的愛國主義的意義和它所可能帶來的桎梏。⁷⁹ 阿披亞 (Kwame Anthony Appiah) 的“愛國的世界公民” (cosmopolitan patriots) 的觀念正是循此方向所作的反思。他深信世界公民主義與普遍的人文主義有所不同，後者朝向全球的同質性，前者則尊重差異。⁸⁰ 簡言之，愛國主義和世界公民主義未必一定是對立的觀念，愛國不等於不能同時接受別人的差異，愛國也可以同時具備批判性，在有必要時將民族和國家分開來看，最重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忍受或同情其他文化傳統的人的差異。⁸¹ 綜上所述，愛國主義與世界公民主義並非相反詞，與世界公民主義相對的應是停滯不前的反動主義。⁸² 可是，從後殖民到全球化的討論中，問題卻往往被錯誤地導入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架構的迷思之中，因此論述場域變得畛域橫梗，“混雜”淪為空洞的口號，表面鼓吹跨越邊界，實則難越雷池半步。

五 結論

卡爾斯泰斯認為全球 / 資訊資本主義已將我們帶進“第四世界”的年代，世界變得比從前更加兩極化，世界經濟滿佈“黑洞”，貧窮問題加劇深化，弱勢族群無處不在。⁸³ 戴力克也認同在全球化經濟的年代，從前第一、二、三世界的區分不再成立，但那不等於不公平的情況稍減。他把問題導向“第四世界”，提醒我們受壓迫剝削的“第四世界”遍佈全球。⁸⁴ 後殖民論述往往打正紅旗為弱勢發聲，但個中卻不是沒有複雜的權力糾結，如“第三世界”批評便因機制化變成職業化的標



籤，再無想像另類可能性的力量，因此要再把戰場導向“第四世界”。戴力克對後殖民論述常持懷疑態度，論點雖或未必全部令人信服，卻正好提醒後殖民理論家再作反思。戴氏說得好：“後殖民批評的最終問題並不在於背棄了其基進的源頭，而是在此過程中，它對現實問題視若無睹，也不再去想一個超越現狀的世界”。⁸⁵ 無論混雜、第三空間、批判的本土主義以至世界公民主義也好，都是希望朝向一個文化和知識活力充沛、生氣盎然的世界，但後殖民論述被全球化學術機制吸納、收編而變得職業化，卻剛好是反諷的失去活力，否向未來。簡單的多元文化主義、世界公民主義未必是活力的保證。施錫克更發出警告，提醒我們“多元主義的開放性與一種新的原教旨主義的對立只是一種虛假的兩難，它們不外是今日の後政治世界的兩個面向”，⁸⁶ 而且多元文化主義是內向、自我指涉的另一種種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者“‘尊重’他者的身分，將他者構想為自足的‘真實’群體，他自己則與其保持距離，而此距離乃由他自己的專有普遍性位置所許可的”。⁸⁷ 簡言之，多元文化主義的中性外表是虛假的，它延伸了霸權的歐美中心主義，不外是——借施錫克文章的名稱來說——“多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費什(Stanley Fish)亦明言，多元文化主義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專櫃式多元文化主義”，⁸⁸ 不同文化展覽於不同櫥窗。三好將夫憂慮多元文化主義除了會被企業利用外，在面對現實的不平等時，也只是有如隔岸觀火，甚至變成以多元文化主義之名，作為漠視弱勢社群福利的藉口，而現實是弱勢社群在各種社會範疇中都得不到平等待遇。⁸⁹ 早於九十年代初，芝加哥文化研究組便洞察到多元文化主義也可能被利用為企業策略，在漂亮的口號之下，內容卻是空洞無物，故他們提出“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說法，分辨多元文化的不同意涵



(如全球資本的企業多元文化、跨科際文化批評、跨越邊界去生產新知識的跨文化研究等)。⁹⁰ “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字首的意義跟在“批判的後殖民主義”和“批判的本土主義”等觀念中的字首可說是異曲同工，世界公民主義也應循此發展。因此，“批判的”這個字首的重點在於凸顯出任何本來具批判性的論述在機制化之後都可能會僵化，其批判性便有必要再一次更新。

誠如察加伯迪所言，近日的批評論述花了不少心力在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普遍與差異的問題之上，因為明白到在強調差異之同時，卻又不能完全廢棄普遍性的假設，故重點是努力在兩難中尋找另類可能，而策略性本質主義 (strategic essentialism)、混雜、世界公民主義都是這場鬥爭的不同策略。⁹¹ 上文有關混雜和世界公民主義的討論正是循此方向的省思。其實上述的“第四世界”也是近日不同理論家嘗試擺脫全球知識生產機制的理論架構的支配，在無處不在的弱勢社群中尋找新契機的另一種做法。比方，施錫克提醒我們，今時今日真正的對立是全球化（興起中的全球化市場新秩序）和普遍的全球不公義的對立，⁹² 而阿柏杜萊則大力呼籲，我們現在急切需要的是從下而上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即草根階層聯結成跨國網絡抗衡跨國資本（即阿柏杜萊所說的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⁹³ 最重要的是需要認識到全球化、自由、選擇、公義等字眼並不一定專屬於“國家 - 資本”連結。⁹⁴ 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化不一定是從上而下的跨國資本版圖擴展，同時也可以是從下而上的全球化抗衡，即第四世界制訂自己的議程，也許如此可一方面將後殖民論述的精神注入全球化年代的第四世界抗衡論述中，另一方面也讓後殖民論述抖擻精神，重拾活力。正如周蕾所言，身分認同討論的最重要貢獻在於重新形塑我們對知識的基本



認識。從後殖民到全球化論述的身分認同討論，我們逐漸認識到身分認同是流動和不停變化的，而知識本身也理應如此。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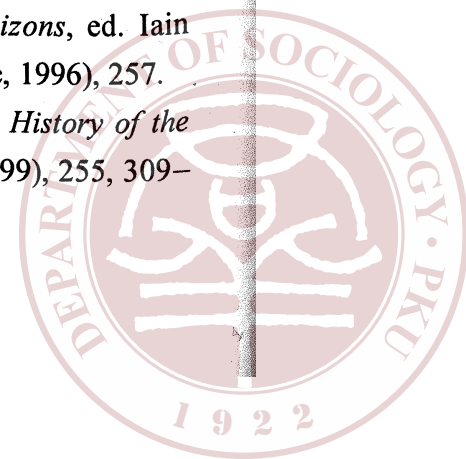
不過最大的困局依然是抗衡論述無論如何也難脫與機制的共謀。在“第四世界”的弱勢社群尋找新理論視點既要滿足發聲的條件，囿限於知識生產的既有成規，便會隨即陷入機制化/合法化/專業化的困境。⁹⁶《後殖民研究》的編輯在發刊辭中坦然承認，他們與西方學術市場機制有共謀關係，但也相信可以從中顛覆既有的知識組構，帶出觀照事物的不同方式。重點是要保持這種顛覆力，後殖民論述便必須不斷向前。⁹⁷《介入》的編輯楊格也在申述創辦此後殖民研究學刊的前言中表明，其目的為發展一個推動理論辯論的論壇，着重發展基進而創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⁹⁸夏維亦說：“有意義的世界公民主義並不是被動的構想何謂全球化的公民性。那該是如康德所堅持的，是介入並改變既存世界的原則”。⁹⁹誠如薩依德所言，知識分子“最大的難題在於既代表自己的工作所介入的事情，而又不僵化為一種機制，或只為一種系統或方法而行事”，所以知識分子要如旅者 (traveller)，抗拒馴化和不斷前進。¹⁰⁰然而，為何這類說法卻要反來覆去的說完又說？畫蛇何妨添足：主要的原因正在於無論甚麼論述——就算是反霸權論述也好——也會因機制化、專業化而失去活力。賀爾曾經在九十年代初說過，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我們不外剛剛開始以全新形式理解跟過去一式一樣的衝突和鬥爭”。¹⁰¹十年過去，滄海早變桑田，但在新世界秩序中此言依然甚是。也許這個說法在何時何地都同樣適用。

準此，後殖民論述不單未曾結束，反而在全球化年代才剛剛重新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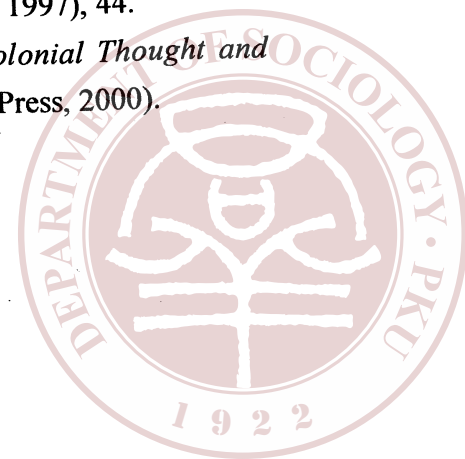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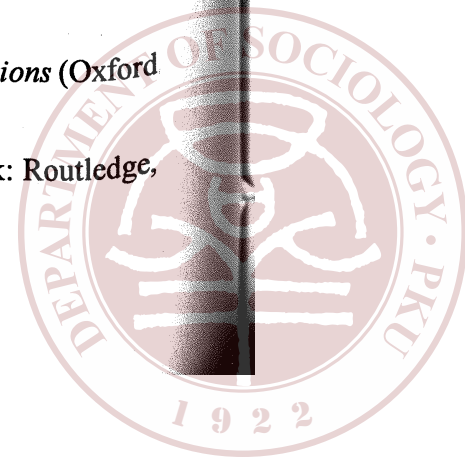
- 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 2 Stuart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in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ed. Anthony 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39.
- 3 Robert Young, "Academic Activism and Knowledge 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Critiqu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2, no. 1 (1999), 31.
- 4 Arif Dirlik, "How the Grinch Hijacked Radicalism: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Postcolonial," *Postcolonial Studies* 2 (1999), 159.
- 5 Fredric Jameson,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in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ed. Fredric Jameson & Masao Miyoshi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4.
- 6 Rob Wilson & Wimal Dissanayake, "Introductory: Tracking the Global/Local," in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ed. Rob Wilson & Wimal Dissanayak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 7 同上注, 2.
- 8 Benita Parry, "The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Transition* 53 (1991), 41.
- 9 Simon During, "Postcolon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A Dialectical Relation After All?" *Postcolonial Studies* 1 (1998), 34.
- 10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74–75.
- 11 Masao Miyoshi, "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Critical Inquiry* 19 (1993), 749–750.
- 12 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42 (1999), 4.
- 13 同上注, 6.
- 14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73.
- 15 Stuart Hall, "When Was the 'The Post-Colonial'? Thinking at the Limit," in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ed. Iain Chambers & Linda Curt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57.
- 16 Gayatri Spivak,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5, 309–310, 363–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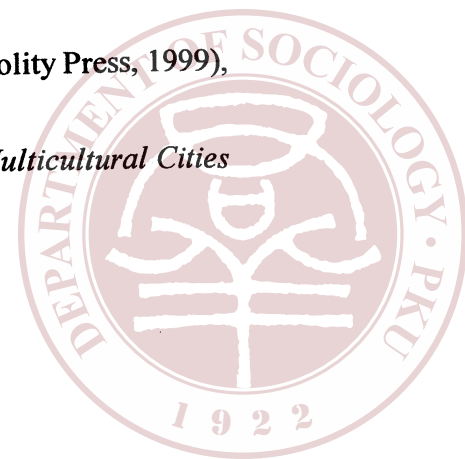
- 17 Hall, "When Was the 'The Post-Colonial'?" 241.
- 18 During, "Postcolon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37.
- 19 同上注, 31-36.
- 20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ism: Between Nationalitarianism and Globalisation? A Response to Simon During," *Postcolonial Studies* 1 (1998), 62.
- 21 同上注, 64.
- 22 到底 "nationalism" 應譯為 "民族主義" 或 "國族主義", 衆說紛紜, 難有定論, 很多時要看文脈而定。為行文上的方便, 除個別地方因特別情況而將 "nation" 翻成民族外, 本文一概採用 "國族" 和 "國族主義"; 有關 "民族主義" 和 "國族主義" 的分別及長短, 詳參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 〈譯後餘話〉, 載於《解殖與民族主義》,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8), 265-268。此外, 有關民族 (nation) 和國家 (state) 的分別, 籠統來說是前者指文化、社會、種族群體, 而後者則指政府機制和統治主權; 詳參 Hug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Boulder: Westview, 1977), 1; Lowell Dittmer & Samuel Kim, "Wh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 Lowell Dittmer & Samuel Ki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1-245.
- 23 Miyoshi, "A Borderless World?"
- 24 Masao Miyoshi, "Sites of Resist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Boundary 2* 22 (1995), 77-83.
- 25 Jameson,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65.
- 26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6.
- 27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2.
- 28 Aijaz Ahma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 *Race and Class* 36 (1995).
- 29 Slavoj Žižek,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September/October 1997), 44.
- 30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1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2.
- 32 During, "Postcolon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46.



- 33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26.
- 34 Bruce Robbins,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in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ed. Pheng Cheah & Bruce Robbin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3.
- 35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96–102.
- 36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37.
- 37 Ella Shohat,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31/32 (1992), 109.
- 38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ism," 54.
- 39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polis 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0 Hall, "When Was the 'The Post-Colonial'?" 251.
- 41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199.
- 42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3), 267.
- 43 Pheng Cheah, "The Cosmopolitical — Toda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 Robbins, 22.
- 44 同上注, 31.
- 45 Pheng Cheah, "Spectral Nationality: The Living On [*sur-vie*] of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in Neocolonial Globalization," *Boundary 2* 26 (1999), 238–239.
- 46 朱耀偉, 〈全球化年代的國族論述: 從後國族意識到中國論述〉, 《思與言》第三十八卷一期(2000), 193–197.
- 47 Cheah, "Spectral Nationality," 239–240, 252.
- 48 Fredric Jameson,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Strategy," *New Left Review* 4 (July/Aug, 2000), 65.
- 49 詹明信以此為例: "美國也會挪用國族自保的話語, 維護有關童工和環境的美國法例, 抗拒 '國際' 干預。這會將對新自由主義的國族式抗衡變成對美式 '人權' 的普遍主義的維護, 因而掏空了反帝國主義的個別抗爭的內涵"。(同上注, 66) 易言之, "個別" 常常被 "普遍化", 使之失去抗爭的潛力。
- 50 同上注, 66.
- 51 Edward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2000), 202–203.
- 52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14.



- 53 同上注, 38–39.
- 54 Pheng Cheah, “Given Culture: Rethinking Cosmopolitical Freedom in Transnationalism,” *Boundary 2* 24 (1997), 167–168.
- 55 Néstor García Canclini,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207.
- 56 同上注, 241.
- 57 同上注, 259.
- 58 同上注, xv. 有關簡堅尼如何以墨西哥城為文化混雜的範例, 詳參同上注, 206–262; 至於墨西哥城如何作為全球化城市, 以及在全球資本衝擊下所呈現的新轉變, 詳參Néstor García Canclini, “From National Capital to Global Capital: Urban Change in Mexico City,” *Public Culture* 12 (2000), 27–212.
- 59 Soja, *Postmetropolis*, 210–211.
- 60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34.
- 61 R. Radhakrishnan, “Adjudicating Hybridity, Co-ordinating Betweenness,” *Jouvert* 5.1 (on-line journal) (2000), 2.
- 62 同上注, 4.
- 63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9–10.
- 64 Arif Dirlik, “How the Grinch Hijacked Radicalism: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Postcolonial,” *Postcolonial Studies* 2 (1999), 151.
- 65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65.
- 66 Cheah, “Given Culture,” 168.
- 67 同上注, 168, 173.
- 68 Radhakrishnan, “Adjudicating Hybridity, Co-ordinating Betweenness,” 3.
- 69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2.
- 70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6.
- 71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1994), 130.
- 72 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194–198.
- 73 Leonie Sandercock, *Towards Cosmopolis: Planning for Multicultural Ci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7), 125.



- 74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38.
- 75 Aijaz Admad,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1987), 3–25.
- 76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 77 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 *Public Culture* 12 (2000), 529.
- 78 Robbins,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1–3.
- 79 同上注, 7;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76.
- 80 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 Patriots," *Critical Inquiry* 23 (1997), 621.
- 81 同上注, 638.
- 82 紀登斯嘗言: "後傳統社會世界的真理是無人有激進思想和行為的專利", 那即是說"保守"、"激進"會隨時換位, 昔日的激進主義很容易會變成今日的新保守主義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250)。有關紀登斯對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新保守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的分析, 詳參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22–50。
- 83 Manuel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London: Blackwell, 1998), 70–165.
- 84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146–160.
- 85 Dirlik, "How the Grinch Hijacked Radicalism," 162.
- 86 Slavoj Žižek, "A Leftist Plea for 'Eurocentrism'," *Critical Inquiry* 24 (1998), 1007.
- 87 Žižek,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44.
- 88 Stanley Fish, "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 or Why Liberals Are Incapable of Thinking about Hate Speech," *Critical Inquiry* 23 (1997), 378–395.
- 89 Masao Miyoshi, "Ivory Tower in Escrow," *Boundary 2* 27 (2000), 43–45.
- 90 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Critical Inquiry* 18 (1992), 550–552.
- 91 Dipesh Chakrabarty, "Universalism and Belonging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Public Culture* 12 (2000), 653–654。策略性本質主義乃施碧娃提出的重要論點, 詳參 Gayatri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5; Gayatri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London: Routledge, 1990), 11。有關策略性本質主義與國族的關係, 詳參朱耀偉, 〈全球化年代的國族論述〉, 206, 此處不贅。



- 92 Žižek, "A Leftist Plea for 'Eurocentrism'," 1007. 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近年有關“中國性”的爭辯中，即全球化年代的知識生產機器的潛在威脅不單在於消滅個別的本土，且同時會播散一種有關知識生產的“普遍”暴力（如建構一種單一的“中國性”）；詳參朱耀偉，〈全球化論述生產年代的中國圖象〉，《清華學報》新二十九卷第三期（1999），233-260。
- 93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 (2000), 15.
- 94 同上注，17。
- 95 Rey Chow, "The Postcolonial Difference: Lessons in Cultural Legitima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 1 (1998), 166.
- 96 阿柏杜萊便曾指出，要成就從下而上的全球化，我們必須改變“研究”的既存僵化意義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8-15)。此說固然合理，但在歐美學院已是談何容易，在知識生產的邊緣地方更幾乎是天方夜譚。有關大學作為抗衡據點的問題，詳參Masao Miyoshi, "Ivory Tower in Escrow," *Boundary 2* 27(2000), 7-50; 和Allen Chun, "The Institutional Unconscious; or, The Prison House of Academia," *Boundary 2* 27 (2000), 51-74。
- 97 Senjay Seth et al., "Postcolonial Studies: A Beginning," *Postcolonial Studies* 1:1 (1998), 10.
- 98 Robert Young, "Academic Activism and Knowledge 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Critique," 33.
- 99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 560.
- 100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London: Vintage, 1994), 47, 90.
- 101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39.

